

□古代文学

杜甫战事诗的题材价值

周鸿彦

(西南民族大学 藏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杜甫的战事诗扩大了边塞、战争的题材范围, 全面反映战争。不仅表现对战争的态度、性质评价, 还表现战争对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周边关系、以及对广大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持久的破坏与影响。杜甫的战事诗实录了战争、战乱的许多重要事件, 全面地展现了“安史之乱”这场长期的战争、战乱历史。

[关键词] 战事诗; 战争破坏; 题材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652(2009)01-0129-08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 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战乱生活题材很自然地进入诗歌创作中。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写及战乱较多的, 有《奔亡道中》、《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扶风豪士歌》、《永王东巡歌》、《南奔书怀》等等。李嘉祐写战后凋残景象: “处处征胡人渐稀, 山村寥落暮烟微。门临莽苍经年闭, 身逐嫖姚几日归。贫妻白发输残税, 馀寇黄河未解围”(《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元结的《贼退示官吏》、《舂陵行》等亦写战争导致的赋税之祸, 甚于盗贼。杜甫评价道: “道州忧黎庶, 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 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在盛唐诗人中, 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 是杜甫。杜甫的战事诗扩大了边塞、战争的题材范围, 不仅表现对战争的态度、性质评价, 还表现对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影响, 实录了战乱的许多重要事件, 全面地展现了战争。杜甫的战事诗, 描写战争的破坏, 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 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 展现了战火中的社会生活画面。在《忆昔 其二》中, 杜甫对比了战争前后唐朝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风貌等, 表现了一个战前繁荣、稳定、强盛的开元盛世: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 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 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 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 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 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 洒血江汉身衰疾。^①

在今昔的比较中, 让我们看到了唐朝经济繁荣、社会秩序井然; 民风淳朴, 人心悟厚; 以及风调雨顺, 祥和富足的态势。安史之乱打破了这种稳定泰平, 战争使农桑被废, 战事频起, 天灾连年, 人们既要承受沉重的徭役、兵役, 又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揭露了遭遇兵燹之灾的人们的痛苦生活。

一 杜甫的战事诗反映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开元、天宝年间, 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 “是时仓廩实, 洞达寰区开”(《昔游》); “邑中九万家, 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 主客多欢娱”(《遣怀》); “吴门转粟帛, 泛海陵蓬莱”(《昔游》), 这些诗歌中展现的是一个繁华太平的开元盛世。然而, 安史之乱后, 从“稻米流脂粟米

[收稿日期] 2008-12-01

[作者简介] 周鸿彦(1975-), 女(藏族), 四川理县人,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文所引杜甫诗句皆出自仇兆鳌《杜诗详注》,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到“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可谓是天壤之别的变化。“开元十三年（725）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1]而此后直到天宝末，物价长期稳定，“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2]。而到杜甫作此诗时广德二年，绢已涨至万钱一匹。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乾元二年三月，第五琦为相，行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由此看出，“一当五十”的乾元钱使米价由开元十五钱暴涨至七千。《新唐书·食货志》亦载此事：“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所以“一绢直万钱”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为何米价暴涨如此？杜甫在诗中也直接揭露了原因：“有田种谷今流血”，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已在战争中由于战乱而成为战场，而土地上的人们或背井离乡，沦为流民，或卷入战争，生死未卜。《羌村三首 其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壶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其中的“酒味薄”和“浊复清”都与“黍地无人耕”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战争，农业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青壮年都上战场了，耕地很多被荒废。“浊复清”形象地描绘出米酒因酿造时间不够，连沉淀物都没去除。“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稟食为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3]从“无榷酒之法”，即不对酒的买卖征税，到“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表现出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农业经济被战争破坏后的萧条、凋敝。

“岂闻一绢值万钱”，由于农失耕桑，绢也由天宝初的“匹二百钱”涨至万钱，足足翻了五十倍。“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是岁（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4]。“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同上》），描写了经济发达，贸易往来频繁，商贾络绎，不绝于道，社会秩序井然，交通运输方便畅达的盛世。“云帆转辽海，粳米来东吴”（《后出塞》），这表明南北贸易的发达。战争的爆发，使道路不畅，社会极度动荡不安，“齐纨鲁缟车班班”的贸易盛况再难复现。“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此诗是杜甫宝应元年

（762）梓州所作，诗人伤感乱离奔走于光禄坂。马惊草动，诗人不担心马坠深渊，而忧盗贼，如惊弓之鸟，风吹草动便使人感觉恐惧，战争使杜甫倍加怀念开元之初井然的社会秩序。

战乱使国家国力薄弱，赋税沉重，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甚至以铸币市场的混乱来搜刮百姓谋取暴利。“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岁晏行》，此诗作于大历四年，由于官家多私铸钱，杂铜铁以牟取暴利，所以杜甫尖锐指出：刻泥为钱更易得，好钱恶钱不能鱼目混珠坑害百姓。恶钱即铅铁杂在青铜中铸造，铸者有利可图，而百姓却蒙受损失。江淮多铅锡钱，铜贵而钱贱，所以有人铸铜为器，牟取恒利，长此以往，则钱尽，所以终于在“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5]。战乱导致了唐朝经济秩序的混乱，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发展，这些恶果最终还是被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这是杜甫大历四年春入潭州所作，吴楚之地，本是未经寇逆之乱的洞庭鱼米之乡，却村野荒凉，民生凋敝，杜甫希望有能之士，叩开帝阍，进谏朝廷，下令宽赋，以恢复经济生产。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向百姓征收重税。除了农业经济的税收外，对于商贸流通的货物也逐加重税：“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重税”^[6]，盐税作为唐财政主要收入之一，在杜诗中有“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盐井》）。据《新唐书·食货志》：“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然而乾元二年，杜甫过成州时，盐价便由官价斗三百转致商贩六百卖出。而“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为钱二百一十，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斗三百七十，豪贾射利，官收不能半”^[7]，缺乏对财政的统一管理，官府、商贾皆从中牟取暴利，破坏了唐朝的经济秩序。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整顿均田制，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广德二年（764）“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8]大历元年（766）又令：“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9]。但由于战争和战乱对社会经济长时间的破坏，藩镇割据严重，唐朝失去

中央集权的统一,边战频繁,唐政府试图通过整顿均田制来解决财政危机,但均田制很难再恢复,唐朝经济一蹶不振。

二 战争对唐朝军政秩序的破坏

唐朝与边疆各国接触频繁,其中与吐蕃、回纥的关系尤为密切。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际地位出现了变化,不但失去盟主的身分,还要向外请救兵,其中回纥就曾两度出兵协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乱。乱平后,唐朝自顾不暇,回纥便居功勒索,屡屡侵扰。另西北之兵被调东进抗敌,西南防务无暇顾及,所以吐蕃、南诏等也乘机寇边。

(一) 战乱对唐朝周边关系的影响

经过安史之乱,唐朝渐渐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安禄山兵乱后,唐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至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

“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讧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十八》)吐蕃与唐王朝的关系很清楚,是甥舅关系,但安史之乱后,唐朝着力平叛,吐蕃伺机经常入侵骚扰。这是杜甫对吐蕃的呵责,也是对其入侵行为的愤慨。“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薄领辛苦江山长”(《大麦行》)。此诗作于肃宗宝应元年(762),党项羌攻梁州,吐蕃陷威、渭等州,麦熟而被羌胡所割,士兵少,又疲于奔命,不能保护边境。“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天边行》)。此诗也是指肃宗宝应二年(763)七月,吐蕃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入长安,十二月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一度攻入长安,使代宗东逃至陕州,后郭子仪临时募兵抗御,吐蕃虽然退兵,却仍时常威胁京畿重地及陇右、剑南诸地。“见愁含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将五首 其一》)。反映吐蕃不断入侵。广德元年(763),吐蕃纠合吐谷浑、回纥、羌等族入侵,十月吐蕃攻入长安,焚烧挖掘陵寝的事,提醒诸将莫忘此奇耻大辱,并告诫他们宜加倍警戒,勿使悲剧重演,边患未除,“将军且莫破愁

颜!”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北征》)。回纥助兵,是唐朝已有的军事传统。杜甫对肃宗借用回纥之兵的建议,认为回纥助兵“少为贵”。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安史乱后的唐朝,已不是开元的盛世唐朝,因此,回纥助兵已发生了变化。肃宗至德二年(757),回纥精骑和郭子仪的朔方军一起克复西京(长安)。杜甫没有沉浸在一片欢庆声中,而能见微知著,心怀隐忧:“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收京 其三》)同年,唐军答应回纥屯兵沙苑的要求,从此以后,回纥骑兵豕突,骚扰不已。至德二年十月,回纥参加新店大战,助唐军收复东京洛阳。但却久留不遣,杜甫作《留花门》,此诗反映出杜甫对回纥恃功恣肆,久留不归本蕃的忧患。“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撒烈。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回纥兵不能剿叛,反而害民的景象。为了尽快收复两京,唐肃宗事前为了求取回纥的帮助,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盟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10]杜甫担忧收京之后,回纥恃功邀赏,肆其淫威,诸将僭奢无度,骄横跋扈,这万方送喜之时,正是祸起忧生之端。而回纥入东京之后,果然纵兵掳掠。“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遣愤》)此诗云郭子仪与回纥再盟,以破吐蕃,追忆回纥助讨史朝义时,矜功放肆侮辱朝臣,甚至掳捶至死,借回纥之举实养毒遗患。“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11]。回纥恃功邀赏,骄横肆虐,固然可愤,但更令人愤慨的是朝廷蔽于近幸,猜忌大臣,养毒贻患,自取其侮。杜甫认为,要讨叛平乱,最重要的是上下之间的同心协力,如果不思修德奋发,只知依赖外力,结果由借兵而召侮,自食其果。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

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 其二》）讽刺将领在安史叛军面前的怯弱无能，丢尽脸面地向回纥求援。“胡来不觉潼关隘”，措辞辛辣。潼关自古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然而在诸将眼里，胡兵一来，潼关也无险可凭了。其仓皇之状可令人想见。每次收京平吐蕃都是借回纥之力，而诸将领中也多有所作为，不思报国之人。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诸将五首 其四》），南方朝贡断绝，南诏王背叛唐朝而与吐蕃勾结，诸将虽有高职在身却不思安抚其地，报效国家，杜甫提醒他们：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大唐的领地，欲作忠良之将，则应全力辅佐圣朝。安史之乱后随着唐室的每况愈下，唐帝国气象一去不返。

（二）战乱导致军阀拥兵自重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使唐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朝廷被迫授安史部将为节度使，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集于一身，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以后其他地区也被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自补官吏，不输王赋，与朝廷分庭抗礼由此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安史之乱完全破坏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分布，在平叛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称号。战乱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唐代宗为了求得暂时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12]。因此，“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13]，形成割据局面。“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诸将五首 其三》），杜甫指出战乱虽平而国内尚未统一，河北藩镇自行其事，诸将虽多相位高衔，而不知屯田务农，致使军粮匮乏，危机严重。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朝廷褒职谁争补？天下军储不自供。”（《同上》）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不屯田积粮，反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以致朝廷的军需供给不足。“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有感五首 其二》），幽蓟之地还有降将，吐蕃羌夷仍然不断侵扰，而各节度使不修职贡，朝使不断谕旨，藩

镇拥兵自重，不听从朝廷调遣。

对于较长期生活在蜀地的杜甫，目睹蜀地军阀尤为甚。他们拥兵自重，与朝廷抗礼，经常发生混战。“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草堂》）。此事件指宝应元年（762），严武被召还朝，徐知道在成都反，从此四川外受吐蕃骚扰，内有军阀混战。后来徐知道又被其部下李忠厚所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 其一》）“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国，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在多官军中。”（《三绝句 其三》）这是永泰元年（765）杜甫离蜀之后所作，揭露了四川地方军阀的专横残暴。“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白马》）此诗反映大历五年杜甫在湖南时，潭州军阀混战，主将崔瓘被臧玠所杀之事。“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军州体不一，宽猛性所将。”（《入衡州》）军阀混乱，荼毒生灵，造成“丧乱死多门”：百姓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总之，战乱导致藩镇割据，而藩镇争斗又再次引发战乱，唐朝社会处于极度动荡之中。“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诸将五首 其五》）杜甫缅怀严武的镇蜀之功，慨叹镇蜀后继乏人，提醒朝廷宜选得力将军充任剑南两川节度使，以确保蜀地稳定。762年，严武初镇蜀而罢，高适代之，即有徐知道之乱，及松、维、保三州之沦陷；765年，严武再镇蜀而死，郭英义代之，不数月即有崔旰之乱，郭英义反为崔旰所杀，蜀中地方军阀凭险作乱，民不聊生，杜甫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三）战争破坏了唐朝建国以来政治格局

安史之乱发生，当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唐朝军事力量的薄弱性即刻暴露出来。叛军所过州县，官兵望风瓦解，新招募的士兵抵挡不住安史叛军，一路攻陷陈留、荥阳、洛阳，直抵潼关。“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北征》）；“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土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秦州杂诗 其六》），“安史之乱，大败者有三，哥舒翰避关之轻出，房琯陈涛斜之车战，邺城九节度之大溃”^[14]。从这三大败绩看出，并非完全兵

力不振,更多的还是唐朝上层统治者之间不清明的政治关系所致。安史乱后,唐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被破坏,外戚、宦官专权是唐朝政治不清明的原因之一。“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今上犹拔乱,劳心焦思补四方”(《忆昔 其一》)。“皇后宠遇专房,与中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请谒过当,帝颇不悦,无如之何”^[15]。“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诸将五首 其四》),这首承第三首写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宦官专权,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朝政了。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鱼朝恩统兵,军无主帅,致使邺城大溃。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政治上最可靠的是宦官,因而酿成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

三 战争使人民生命财产饱受重创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无家别》)战乱使社会遭受了一次浩劫,经过战乱,广大百姓无家可归。《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噪。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

(一) 人们饱受战争赋敛之苦

与杜甫同时代的元结作《舂陵行》与《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写安史之乱以来道州一带被赋税逼迫,民不聊生。杜甫读此诗后,给予很高评价:

“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战争需要大量的物资,“安史之乱”耗尽国库,使唐朝财政雪上加霜。财政主要收入是税收,战乱中的百姓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兵车行》),唐天宝年间的拓边战争,兵源从民中招募,但却不免赋税,百姓承受着深重的负担。安史乱后,赋税更加重压在百姓身上。“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喫,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甘林》)仇注认为:里老作三番诉问:挥旧粟以供赋敛,一诉也:卖新豆以应军需,二诉也:公家迫索如此,何时得以少宽,三诉也。赋税与军需之用对百姓压榨之深,而“主人”最关心的却是“戎马何时稀”,他明白这些横征暴敛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只要社会稳定,便可以安于生产了。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此诗作于大历三年,极写百姓赋役之苦,只有卖儿卖女还租庸,可谓人间惨剧。“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此诗作于大历元年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然而却村村皆哭声,寡妇都被“诛求尽”,不剩一物,其户口销于兵赋,但仍要征税,可谓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锥”(《夔府书怀四十韵》),受重赋苛税盘剥猛于虎。“毒瘴未足忧,兵戈满边徼”(《次空灵岸》),兵戈与战事(直接导致重税)比毒瘴更令人担忧。

“凄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驱竖子摘苍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枯棕》);“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遣遇》);“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对于官吏、军阀的巧取豪夺,杜甫看到了战乱中老百姓承受着军需与政府财政苛捐重税压榨,饱含着对老百姓的同情,写下了反对“诛求”的大

量诗歌。“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孽孽能全生”（《释闷》）；“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东屯北崦》），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由于“诛求”引发的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杜甫大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安得农务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杜甫看到了人民受赋敛之苦的直接原因。连年战乱不息，尽管湖南少经战争侵袭，且有“鱼米之乡”美称，但这里人民却因为重税，和战乱中的人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杜甫在《东西两川说》中也反对“诛求”：“但均田薄敛，则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所以，安史之乱结束后，杜甫从夔州到湖南诗作中对战事诗的描写更多的是战乱给人民造成恶劣后果的描写。他希望统治者能恢复“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的“男谷女丝行复歌”的稳定泰平的社会秩序。

（二）战争使人口锐减，社会极度动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忆昔》）；“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遣怀》），杜诗中展现了安史乱前唐朝人烟繁华、喧然名都、人气旺盛的泰平盛况。据《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统计，上元元年（760），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与天宝十四年（755）相比，国家控制人数减少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仅五年的差别，战争使人口骤降如此。仅潼关之战后，战争中老百姓虎口余生：“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北征》）“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犹有百家存。”（《白帝》）“空村唯见鸟，落日未逢人。”（《东屯北崦》）“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塞芦子》）等等诗句，是杜诗中对战后荒凉无人的空村墟落的描写。百姓或死于战争，或被饥荒饿死，或因于重税，或不堪赋役流离失所，年青及壮的男子被征兵，城中村落只剩下老人、小孩和妇女。在战争中，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迅速增长，而自然的出生却在迅速下降。“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遣怀》）；“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矛”（《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连荒无人的地方，都被战争所袭卷。“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与“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客主多欢娱”形成鲜明对比。

安史之乱后，豪强和藩镇疯狂兼并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使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宝应元年（762），元载在江淮追征天宝末年以来人民积欠的八年租调，战争创伤已耗尽民脂民膏，但官府甚至“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16]。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可谓“官逼民反”。战乱兵燹、自然灾害、苛捐重税，终于激起了农民举兵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等等。“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杜甫在诗末加有小注：“时闻浙右多盗贼。”“盗贼”的内涵在杜甫的思想观念中是相当复杂的。他认为盗贼不是天生的，是被逼出来的，是统治阶级一手造成的。在他的《有感五首 其三》里就写道：“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农事已休，兵戈未歇，天灾干旱，岁无宁日，官逼民反，杜甫忧思不断。浙右的农民起义源于官府的横征暴敛，杜甫不希望在内外受乱的唐王朝下再有后院起火的农民暴动，这是着眼于大局考虑，无论“滂沱洗吴越”是否针对袁晁，都可以看出杜甫对兵燹过后老百姓生存处境的极度同情。

（三）战争对人伦的破坏

杜甫关于战事诗的描写贯穿了整个玄、肃、代三朝皇帝。表现了拓边战争、安史之乱、吐蕃侵扰、回纥助兵以及藩镇混战给百姓造成的杀戮之灾。“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北征》）“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去秋行》）“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发阆中》）“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白帝》）“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

呻吟更流血。”(《北征》)这些都是杜甫亲眼目睹人们饱受战争荼毒的惨状。在兵役、重税、杀戮争斗下的百姓在内乱外侵后,生命财产遭受致命的重创。

与杜甫同时代的元结《舂陵行》中也反映了当时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惨境。“胡星坠燕地,汉将仍横戈。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战乱让百姓承受着沉重的负荷,连猛兽都害怕饥饿的人处处铺设的陷阱,还易子而食,惨绝人寰。“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元结《舂陵行》)元结的《贼退示官吏》、《农民怨》、《去乡悲》等对战乱、贫民的写实与对人民的同情。而杜甫对于这种民不聊生的表现,更全面,更深刻,更丰富,更深情。“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又呈吴郎》);“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杜诗表现了战争中最底层的人民在生存线上的挣扎。战争夺去了大量兵卒的生命,这使其妻子因为失去丈夫而成为寡妇,老母失去儿子而失去依靠。官府军吏的横征暴敛,使他们的生活“贫到骨”。被征兵的男子面临着生死未卜的战场,而妇女、儿童、老人等老弱之辈也在战乱中痛苦煎熬:“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战争让儿童也不能幸免于难。“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石壕吏》)过度兵役已使官吏不再征兵,而是捉丁,而且乘人不备在晚上抓人,连老头都不放过。三个儿子已经都上了战场,还要老妇随军做饭。《垂老别》中本应安度晚年的老人却还要再上战场。“夔州处女发半华,四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负薪行》)夔州土风重男轻女,女子要承担所有生活重负,由于生活重压,一般长相粗陋者难嫁。但更因为“丧乱”而不能出嫁,直到四五十还无夫家,杜甫在此诗中对贫苦的夔州女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对于这种情况,杜甫并没有简单地只写现象,而是继续追究这背后的原因:“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同上》),并非她们丑陋,而是生活折磨和丧乱所致,妇女的命运在战争中更加悲惨。

战争使建立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男尊女卑”的思想居然改变了:“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

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由于过度兵役,使百姓为了保全家室宁愿生女不爱男!即便女子出嫁,也不愿嫁给士兵。“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新婚别》),这种反常现象体现出战争对人民生命的残害与人民对战争的极端憎恨。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入侵,唐朝政府借回纥之兵打击吐蕃,收复洛阳,但却引狼入室,回纥久留不遣,大掠东都,烧杀万人。宝应元年十月,第二次收复东京前,“回纥可汗继进于洛阳,列营而止数月,去营百余里,人被剥劫逼辱,不胜其弊”^[17]。收复东京后“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仕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18]。杜甫对借回纥之兵的不良后果和隐患也有揭露:“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藩镇争斗,也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 其三》),“殿前真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谴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 其一》),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百姓饱受战争摧残。

无论何种性质的战争,饱受战争摧残,惨遭重创的还是普通百姓,所以杜甫发出内心呼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行》),杜甫是反对战争的,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存战争,本质上都持有一种批判态度:“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释闷》);“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凋霜,曾是戎役场”(《又上后园山脚》);“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杜甫希望战争早日停止,让战士都能解甲归田,永远停止战争。

[参考文献]

- [1][2][3][5][6][11][宋]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14][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8][9][宋]王溥.唐会要逃户(卷八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新唐书·藩镇魏博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3]新唐书·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5]旧唐书·后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7][18][后晋]刘昫.旧唐书·回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何来]

The Thematic Value of Du Fu' s Warfare Poems

ZHOU Hong-yan

(School of Tibetan Research,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Du Fu' s warfare poems expanded the range of poetic themes. These poems not only express people' s attitudes to and evaluations of the wars, but also the influences of wars on the incessant damages to or influences on the economy,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people' s life and properties. Du Fu' s warfare poems recorded many important war affairs, fully displaying the history of "An and Shi Rebellings".

Key words: warfare poems; damage of war; thematic value

(上接第 128 页)

The Tragic Theme of Saga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G Hai-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shui Teachers College, Tianshui, Gansu 741001, China)

Abstract: "Family" is the most direct and thorough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in reflecting life, reviewing human nature and disclosing the theme. The saga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always permeated with a strong sentimentalism. Tragic theme is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e novels of this kind. All the "families" in all the novels during that period inevitably broke up in the end. The writers implied in the tragic end of the saga novels that the feudal culture was declining.

Key words: saga novels; tragic theme; cultural implication